



第九届

明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

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市场史研究的贡献
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
论明末苏松常三府之均田均役
郑成功海商集团兴衰的历史反思

主编 = 陈支平

明清时代工商业市镇的发展与商人

洪门考源

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明代中期福建省内建置新县的理想与现实

明代科场案

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姓名考

关于独往性幽《本师隐公大和尚传赞》

主编 = 陈支平

第九届
藏中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廈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陈支平主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9

ISBN 7-5615-2130-8

I. 第… II. 陈… III. ①中国-古代史-明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傅衣凌-纪念文集
IV. K248. 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355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沙县长安路金沙园区 邮编:3655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25 插页:2

字数:700 千字

定价: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002年8月25日至30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中国明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在武夷山顺利召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美国、韩国等地的15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着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主题以及明代政治、军事、文化、习俗等许多有趣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促进了国际明史学界的学术交流。

2002年,恰好也是已故明史专家、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创始人傅衣凌教授冥诞90周年。傅衣凌教授生前为明史的学术研究辛勤耕耘,建树良多。此次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为明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辈学人。

在这次盛会上,各地学者提交的论文共78篇。其中24篇作为“纪念傅衣凌教授诞辰90周年”专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2001年第4期以及2002年第1、2、4期上发表(详细目录见本书附录)。其余的54篇,编辑成为这部《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明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明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需要国内外同仁的努力开拓。我们谨借此纪念论文集出版的机会,祝愿明史学界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迎接新世纪的学术洗礼。

陈支平 谨识

2002年8月29日

目 录

前言

- 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 唐文基(1)
-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市场史研究的贡献…………… 郑学檬(5)
- 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
- 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 钞晓鸿(9)

经济史与社会史…………… 行 龙(18)

明代中期的北虏朝贡贸易…………… (日本)松本隆晴(25)

论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剌部与明廷的朝贡贸易…………… 胡 凡(31)

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 高春平 田晓红(37)

论明末苏松常三府之均田均役…………… (日本)滨岛敦俊(42)

明清时代工商业市镇的发展与商人

——以景德镇、河口镇为中心…………… (韩国)吴金城(59)

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海外移民…………… 黄启臣 庞秀声(63)

论闽南地区的重商倾向与海外贸易…………… 李祖基(68)

郑成功海商集团兴衰的历史反思…………… 陈支平(75)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

——以明清至解放前的福安县为例…………… 王 辛(82)

明朝中后期居室文化初探…………… 滕新才(95)

明代奴仆与社会发展关系…………… 牛建强(104)

明清“淫祠”浅论…………… 高致华(113)

洪门考源(上)

——江右史谭之九…………… 吴之邨(123)

关于明末河南永城县刘超之乱…………… (日本)佐藤文俊(142)

明末“流寇叛乱”与区域社会…………… (日本)吉尾宽(146)

明清时期的海盗与地方基层社会…………… 郑 瑾(150)

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张显清(153)

朱元璋振兴明朝的理论构想及其施政方略…………… 吴量恺(162)

论永乐盛世…………… 晁中辰(170)

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 林延清(176)

明代中期福建省建置新县的理想与现实…………… (韩国)元廷植(182)

再论“移官”	张宪博(189)
明代科场案	张德信(200)
明代州县官个案分析之二	柏桦(208)
明代凤阳官吏的组成	陈怀仁 夏玉润(214)
明代河南宗藩浅述	张民服(224)
孙承宗与《车营百八叩》	余三乐(231)
论隆武帝时期的闽军	徐晓望(239)
朱元璋、蒙古部族与明初长城	何宝善(246)
明代山西阳城县的古城堡——砥洎城	张正明(254)
明祖陵的地位及其影响	陈琳(260)
明东陵考古纪实及学术价值	贺云翱 王前华 邵磊(267)
明代的华夷之辨	张兆裕(272)
明代宣德时期的中外关系	赵中男 于虹(279)
郑舜功《日本一鉴》之倭寇史料	郑樑生(284)
明援朝抗倭胜因管见	马曙明 任林豪(310)
陈第、沈有容与《东番记》	李祖基(315)
1628年(明崇祯元年)在台湾的日荷纷争	卞凤奎(321)
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姓名考	南炳文(328)
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	李琳琦(336)
颜钧的七日闭关与社会思想	(韩国)李庆龙(343)
万历官修本朝正史活动的倡导者——陈于陞	李小林(348)
《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	吴琦 冯玉荣(354)
关于独往性幽《本师隐公大和尚传赞》	(日本)小野和子(361)
美与丑、善与恶的共存及其流变 ——从戏曲小说的世界看晚明人文思潮的精神指向	张和平(368)
徐爌的藏书及其目录学思想研究	刘蔷(380)
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	曹江红(385)
明末清初的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	余同元(393)
明清之际福建的郑芝龙生祠碑文	黄真真(399)
郑成功部属阮旻锡与《夕阳寮诗稿》	何丙仲(401)
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发表本次会议论文目录	(413)

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

唐文基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是一代宗师。今年是他诞辰 90 周年,恭草此文以表对业师的纪念。

在傅衣凌教授之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和商业资本的,不乏其人。然而傅衣凌教授则是近代对中国封建商业和商业资本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发凡者。他以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为基地,从商人和商帮的组成成分,商业的市场条件,商业资本的特征,商人与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特别是乡族势力的关系,商人历史作用,商业资本的转化,16—17 世纪中外商业资本比较,对外贸易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其研究成果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突出贡献。

傅衣凌教授是满怀着民族情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他对中外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理论十分反感。他受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论战的启迪,开始了社会经济史的探讨。这种探讨是从农村经济开始的。1944 年出版的《福建佃家经济史丛考》是他成名之作。但是,探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长期停滞,他深感仅探讨农村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其他社会诸因素,考察商业和商业资本。为此,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1947 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使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徽商研究者。继而又发表了《明代陕西商人考略》、《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清时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明代江苏洞庭商人》、《明代福建海商》等论文。1956 年,他将部分研究成果结集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几十年研究,傅衣凌教授的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商业资本和生产相联系,商人控制生产的初步萌芽,这就否定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说。”^①

傅衣凌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区域是多元的,有平原、有山区、有沿海、有内陆,各自发展”。^②经济多元化,是促进商业发展的一个因素。他说,明清时期“商业的规模,商人活动的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③据他的研究,这个历史阶段商业发展新水平表现在:

第一,出现了专业性商人。他说:“于是在为解决广大市场需求与小的分散销售之间的矛盾,全国各地商人十分活跃,出现了专业性商人,并形成了一批资本的商人集团,董事会,著者

① 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6 页。

②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 页。

③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 页。

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海商、江西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以及地方性武安商人、龙游商人、束鹿商人、山东黄县商人等等。”^①

第二,出现了一批专业性集镇及其相应的市场。如以丝织业著称的江南盛泽镇,以棉布业著称的松江,因榨油业和蚕丝业而发展的浙江崇德石门镇,以制瓷业著称的景德镇,以铁器制造著称的广东佛山镇,等等。^②

第三,明清时代各地大小类型的城镇会集发展迅速,“……无疑大大促进商品的流通和交换”。^③他认为,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城市,一类是以开封为代表的“消费城市”,另一类是以苏、杭为代表的工商业城市。“这说明明清社会已向着自己的合理道路前进”。^④

第四,白银成了主要交换手段。他说:“利用白银作为货币,始于唐宋,但真正作为主要的通货却是自明代开始的,并且在弘治以后逐步普及的。”^⑤“私人海上贸易的发达,特别是白银货币的大量引进,无疑对于国内商品流通和交换以及沿海各地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⑥

第五,山区经济也已卷入商品交换市场。一般人总认为山区经济是封闭性的,傅衣凌教授却独具慧眼。他研究了闽赣山区、江浙山区、湖南山区、巴蜀山区、川湖陕山区、豫皖山区等等山区经济,看到了山区虽然有封闭性的一面,却又存在商品性生产的开放性的一面。他说:“一般的说……山区较为落后的。……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这些山货,如茶、柏油、桐油、漆、棕、靛、纸、木材、果品等等……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或系地主阶级的奢侈品,而不是农民自己生活上的必需品,绝大多数要通过市场而出卖的,因此,某些山区生产曾出现有商品性较大的建宁、永定、连城,江西的金溪、南城、瑞金、雩都、吉安等都有不少的商人,他们都在闽赣山区之中。……唯是中国有些山区经济,其商品性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亦系事实。”^⑦

第六,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引起了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化。如“工商皆本”主张的出现,农民平均主义斗争的提出,李贽、汤显祖等叛逆和异端思想的出现,反禁欲,崇奢侈等等。

第七,商业资本已介入生产,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946年,他撰写《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⑧就是论述川陕湖三省边区的山区手工业生产因商品经济的驱动,已发展至接近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这是第一篇论述清代工场手工业的专文。此后,傅衣凌教授以毕生精力探讨了商业介入纺织、矿冶、制瓷、榨油、航运和农业的情况,成为史学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性论著。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人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正在减弱。但是,不论对傅衣凌教授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成果持何种态度,傅衣凌教授对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论述至今依然有其学术价值。他勾勒出的明清时期专业商人的出现,专业市场的形成,山区卷入商品的流通,白银成为主要的通货,商业发展导致思想观念的变化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

①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②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③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④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⑤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⑥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⑦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⑧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至175页。

图景,我以为,他实际上描绘了发生在16—17世纪中国的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傅先生当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商业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提。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任何单方面的变革或孤立的发明都不会造成工业革命,变革的社会条件是通过几百年的商业资本主义才形成的。^①至于商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在商业革命发生之时是否存在产业革命的萌芽,换言之,即对傅衣凌教授的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傅衣凌教授“总之,自明中叶始,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变”的论断却是至理名言。^②

对于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傅衣凌教授也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中国商人的致富,是靠着巧取豪夺,而不是从正当的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他们不是等价的交换,而是采取超经济的封建剥削,这样,就使得中国商人的活动与封建的榨取方式极为接近;使得中国商人不可能纯粹的从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获得利润,而是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甚至与官僚互相勾结,邀取官职,富通王侯。”^③这里,傅衣凌教授把明清商业资本的历史局限性概括为三点:(1)和土地资本相结合。他说:“中国很早便出现土地买卖,这本是好事情,但由于其他条件不具备,手工业生产的条件不具备,土地过早地买卖反妨碍着工商业的发展。这使商业资本有其他出路,而不必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它可以把过剩的资本用来购买土地。”^④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商业资本惯于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路。(2)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他曾以江西商人资本为例说:“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在明代江西商人资本里是很突出的。”^⑤(3)与官僚相结合。他说:“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占有是意味着特权的赋予,中国商人虽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⑥因此一方面,商人欲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与封建官僚相勾结。他说:“盖因中国的商业资本于其育成的母体中,常依靠官僚的帮助。”^⑦另一方面,封建官僚也由于商业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工商业,操纵工商业,造成了“城市主要商业大权,是操在大官僚的手中,如盐、铁、当、行商等,都是官商”,^⑧因而形成“官与绅,绅与商历来是互通的局面”。^⑨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还有另一个鲜明特征,即和乡族势力相结合。这也应当视为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另一局限性。我们知道,傅衣凌教授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并非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政权、族权对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影响。关于乡族势力的作用,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天高皇帝远’,即中央专制主义的势力尚不能深入各地民间的反映。因而中国地主阶级便积极扶植、利用这乡族势力,用以干涉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⑩读了傅衣凌教授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乡族势力与商业、商业资本的关系有如下见解:第一,地主阶级通过乡族势力涉足工商业活动,出现乡族商、乡族工现象,如徽州举族为商,这使得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交织着不少封建经济成分。福建安平还存在乡族偕行海外经商现象。第二,乡族势力控制城乡市场,“墟市中一切活动,象度量衡、商品种类、贸易习惯以及运输权等等,差

① R·波特等编:《历史上的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②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③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④ 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⑤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5页。

⑥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⑦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⑧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⑨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⑩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不多都受到乡族势力的严格控制,而不得自由、独立的发展”,^①从而表现出封建经济的割据性。商业行帮的产生,也与此有关。傅衣凌教授指出:“本来,在大一统的中央专制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封建市场,已超出地方性的活动,而倾向于全国性的发展。尽管如此,可是由于它的广大基础,乃是无数的乡族市场,它保护了本地方的利益,阻碍大城市的出现,具有严重的封建割据性。这又是封建时代中国国内市场的矛盾的一面。”^②第三,乡族势力控制了城乡工商业行会。“在中国,手工业帮会制的发展基地不在城市,而系从乡村延长到城市去”。^③在乡村是族长,在城商界都是领袖,如徽商等。第四,由于商业资本和封建乡族势力关系密切,“于是这就形成中国城市的工商阶级对封建地主的斗争性不大,反成为封建势力的拥护者”,^④“凡是商业资本发达的地区,乡族势力愈见强大,封建道德观念甚为浓厚”,^⑤“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中国市民等级的成长是如此不易,殆即受这乡族势力羁绊的结果,也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因素”。^⑥傅衣凌教授关于乡族势力对社会经济影响这些论述,无疑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延缓原因的认识。今天,我们再研读傅衣凌教授的著作,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局限性,使得发生在16—17世纪的那一场商业革命并未完成。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①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② 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③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④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⑤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⑥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市场史研究的贡献

郑学檬

傅衣凌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他对中国市场史研究的贡献作一简短的分析。我第一次知道他关于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在1959年的“拔白旗”政治运动中。由“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批判所引发的政治风暴,甚至波及学术界,发生了今人无法想象的学术批判运动,当时叫做“拔白旗”。“拔白旗”,是为了“插红旗”。要“拔”的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要“插”的是“无产阶级观点”。由于傅先生有《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两本著名的书,他便成了“白旗”、“典型”,被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我们这一批高年级学生得以“荣幸”地参加了“洗礼”。现在已记不清总共批了傅先生几个观点,只记得重点批他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的观点。傅先生的“国内市场”理论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当时并不清楚。事过四十多年,想起来感慨万端。以下拟从四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一、立足商人个案研究,展现市场网络

市场是商人的活动空间,商人是市场的主体之一。无商人即无市场,无市场则商货不畅。这些道理古今并无二致。因此,从商人和商品流通入手研究市场便是多数经济史学者选择的方法。傅先生也是如此,但是他比其他人更集中地从商人的个案研究中,去发现市场和市场网络。并且由于他善于利用方志、族谱、契约文书,因而对商人的研究,资料之丰富,几近车载斗量,问题的开掘一般也比他人深入。他的这种治学风格,当时就令人瞩目。

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傅先生对明代徽州商人、江苏洞庭商人、福建海商、陕西商人、东南洋铜商、厦门洋行等商人进行分析,其中涉及他们的市场网络。例如徽商,经营茶叶者行商四方;经营食盐者遍贾淮海江汉,涉及淮南(扬州)、浙江、汉口、河北(长芦)、四川等地;经营粮食者穿行江楚诸省,其中“江浙两省的粮食贸易,便被徽人所操纵,而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第56页)经营木材者甚至“赴闽市木”;经营海上贸易者,除以浙江之双屿、列港,广州,漳、泉为基地与番商贸易外,还深入皮岛(黄海小岛),“独占朝鲜贸易”。(第59页)经营布匹、丝与丝织品者,北至秦晋,南及浯屿(厦门港)。

再如洞庭商人,江湖间叫“钻天洞庭”,他们“遍种果实”,“兴贩南北”;“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第96页)上海、金陵、武汉,都有他们的足迹。而内地的陕

西商人和福建的海商,亦有自己的经营地盘。“陕商的活动地盘,是以陕西为本据,日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之间,构成鼎足而三的据点。”(第170页)福建海商早在宋元时代即已“北上山东、朝鲜,东赴日本,南入交广,远航南洋各岛。”(第107页)明代漳州的海沧、月港、浯屿成为中外互市之地,海商远涉东西西洋诸国(详见张燮《东西洋考》)。

复如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和厦门洋行,前者多集中于江浙两省,后者情况稍有不同,雍正五年以后,“于是洋行乃成为经理洋船的进出口以及外国商人与本国商人所经营南洋各岛与国外贸易的中介机构”。(第205页)洋行所联络的外国商人以菲律宾、暹罗商人为主。

傅先生认为流通形成市场。他说:“这些大小商人的活动,自更有利于把全国各地的物资的流通,初步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试探》第15页)从另一角度说,跟踪以上商人的活动足迹,可以画出一幅明清商业地图,这幅地图实际上就是一张市场网络图,再结合该书中所列举的商人经营实例,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知道明清时代商业市场营销过程。所以傅先生虽然没有提到市场网络,但他的商人个案分析,展现了明清时代国内市场网络的基本图景,对于中国市场史中的市场网络研究,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从生产和分工研究市场,发人深省

傅先生不是单纯地从流通去研究市场,而是非常重视从生产入手分析市场。我们知道,市场的经济学定义和历史学定义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这是就市场功能而言;而历史学家则认为市场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交换或资本流动的空间,比方我即作如是观。历史学家的观点可能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异议,但我还是坚持此说。

傅先生在商人的个案研究中,即非常仔细地寻找商人发迹和他的有特色的生产之间的联系。现主要根据“资本”、“试探”两书举出以下例子:(1)江南农家多种桑,特别是“湖俗以桑为业”,从而为苏州、金陵等大小城镇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棉花的种植,也为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丝、棉纺织业又带动了相关行业如蓝靛种植、整染业的发展。生产及随之而来的分工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商人。他说:上面已经说明,明代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达,特别是江南城镇的发达,专业乡村的出现。这种社会分工的结果,就促进“这些单位以商品形式生产特别的生产品,同其他一切生产进行交换。”^①那么,这就提供给商人以进行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地盘。所以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像苏州商人、洞庭商人、湖州商人、宁波商人、龙游商人等都是顶有名的商人,其他如松江、无锡、常熟等地也有不少的商人。更为有趣的是,江南的棉纺织业还造就了一批陕西商人。万历时,宁夏镇的军用布花系取给于陕西布政司,固原镇的军用布花系取给于西安等卫,甘肃的军用布花系取给于西安、凤翔两府,这类特殊的需求,促使陕西商人远赴江南采购布花。上海之标布,即以远销秦晋诸路而闻名。^②(2)陕西制烟业的产销也造就了一批著名商人,其事颇为典型。他引用《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二岳震川的论述:“今汉中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二三。城固渭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南郑城固大商贾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舳舻相接,岁糜金数千万金。”汉中的种烟业造就了一批烟草经销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傅先生通过对严如昱《三省边防备览》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9页。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7~168页。

等专书和地方志的研究,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先进地区有落后因素,在落后地区有先进因素,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现象。即‘萌芽’不仅存在于沿海和江南的经济先进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山区。为什么山区会出现‘萌芽’呢?这和山区的棚民、矿民有关,因为他们或从事于煤、铁等矿物的开采;或从事于松、杉、漆、麻、烟、茶等经济作物的栽种;或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他们的产品都不是农民本身所能消费了的,必须到市场上去出卖……我还有这样一个想法:内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形态有的较沿海地区还更加成熟。”^①这一论断说明,只要有商品生产,不管何时何地,都会形成市场。(3)他在寻找生产和市场关系的同时,特别注意寻找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的关系。他说:“不过由于明清时代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已出现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个变化,就在一定程度内促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引起国内市场的形成,促成城市人口的增长。”^②傅先生在“试探”一书中所做的明代江南富户经济分析,可以说是20世纪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论。1959年对他的批判,焦点之一也是这个问题。现在重读这些论述,深感其剖析之精辟。例如他指出:经营地主,可分为身份性和非身份性两类,后者“与墨守成规决裂了”,“有一部分是依赖于市场”。^③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傅先生把生产和分工,商人和商业活动,市场这几个环节联系起来考察,并且特别强调新生产方式对市场发展的影响。他在去世前编成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之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生产、交换、市场的观点。上面提到:市场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交换或资本流动的空间。唯其如此,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发展水平不同,市场模式也不同。明清时期处在历史的转变阶段,其市场模式也与后世不能相比。傅先生说:“这一种市场,自然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意义的国内市场,但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国内市场。”^④由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阶段的划分,已有权威结论,不容学者置喙,所以傅先生在国内市场的表述上是留有余地的,只用“相当广泛”之类修辞含糊其辞地加以应付。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在说明这种市场发展的阶段性,虽然他没来得及系统阐述他的市场理论。

三、从资本形态考察入手,提示市场局限性

傅先生十分重视“资本”的研究。他在《资本》第一篇《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中,对中国商业资本历史作了精辟的简述。他根据商人资本的利润由两部分组成的理论,分析明清时期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首先,他认为商人资本既是从小商品生产者中分化出来,又以压迫、剥削小商品生产者起家。就是说,中国的商业资本是从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并和他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与欧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相比有所不同。其次是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的工人而获得商业利润。又次,傅先生从经营制度上发现伙计制“对于扩大商业资本的利润是起着作用的”。^⑤最后,商人资本从商业剥削过渡到掌握工业生产。

① 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9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④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⑤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

傅先生十分重视生存于封建社会环境中的商业资本的特殊性。其一是中国古代的商业资本处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它们长期保持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状态,而且非常分散,这种小商品生产者因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所引起的经济和时间的节省,更限制着中国手工业脱离农业副业地位而独立”,“同时,中国各地的星罗棋布的圩集,也更助长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圩集一方面维持分散的家庭手工业,限制手工业的独立化,一方面也阻碍其往大市场方面发展。“即在这个场合之下,商人要集拢大量的商品和物资,可以不必自己去直接控制生产机构,以加工的方式出卖商品,因而进一步的购买原料和劳动力,把小经营转化为大经营,而可利用这无数的大小的圩集组织,来达成其所要求集中商品的目的”。^①其二,在中国的地主经济下,封建统治者既需要一定程度发展的工商业,又歧视它的发展。所以,中国商人直接走向工业家的道路不是那么顺利,而是一个极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一般商人只于固有商业利润中已有大利可图,而不必亟亟于从事生产,又借流通领域来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转到在生产领域中直接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②

在分析了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的现象之后,傅先生指出:明清时期“各地工商业的发达已给予商人开一广阔的前途,比单纯的购买土地、收取地租更为有利”。^③也就是说,本来商业资本可以比较顺利地向产业资本转化,但是由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使其向官僚资本发展。他总结说:资料说明,“中国商业资本的增殖方法,多不由正当的途径,而率利用封建的独占方式,以巧取豪夺致富。自然,这赋予中国的商业资本极富于游离性质,缺乏坚实的基础。同时,使他们也必须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且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④

我想,上面这些引述,已经可以说明傅先生对商业资本的考察比同时代学者深刻,尽管他并非无懈可击。再者,生产是市场发育和扩大的前提,而资本形态则是市场成熟与否的关键,资本形态的某种原始状态、伴生状态,本不足为奇,但是,正如傅先生所说,在政治体制的反作用下,它会畸形发展,对资本主义萌发和市场经济萌芽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资本形态的局限性就是市场发展的局限性。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以外,傅先生还从一些不为人知的角度去研究市场。例如农民起义,一般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封建上,而他除了讲反封建外,还提示明清之际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这些地区的奴仆更多地参加工商业,和市场的联系比佃农更为密切。^⑤又如人口流动,也促进移住地的经济开发,对于市场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总之,在中国市场史的探索中,傅先生无疑是一位有胆识的先驱者。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5页。

③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④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页。

⑤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2、93页。

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 ——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

钞晓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经论及“俗尚奢靡”问题。他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城镇已出现“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质的萌芽”,不仅工商业者地位提高,而且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这种“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楫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傅先生指出,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位,反不易为生”的主张,与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的思想相类似。从整体而言,傅先生的上述讨论是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部分,文中不厌其烦地摘述陆氏之论,目的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为着提供更多的史料,便于展开问题的讨论”。傅先生后来在1979年赴美讲学期间,也继续留意于明代的“崇奢黜俭”等问题。至20世纪80年代,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多次讨论社会风气,他指出,“象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门辟出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后来经他审定提纲的《明史新编》中,对有明一代社会风尚的关注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①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②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葛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②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不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 80 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 20 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①也

^①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 年第 12 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 年第 1 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嬗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 年第 4 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

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①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②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③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④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⑤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⑥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⑦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侈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⑧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⑨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① 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②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③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④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侈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⑤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⑥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⑦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⑧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⑨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